

再议考古出土的玉柄形器

石荣传 (中国海洋大学艺术系)

摘要：玉柄形器，由于其形状未见于任何史籍的记载，自从这种器物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以后，其名称、用途等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依据近年来在三代至秦汉墓葬中出土的玉柄形器的数量、造型、纹饰、组合关系等，梳理其发展的大体概况，对其功能作了一些粗略的分析和推测。

关键词：考古；出土；玉柄形器

中图分类号：K87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0)03-0022-09

关于玉柄形器，由于其形状未见于任何史籍的记载，自从这种器物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以后，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从其出土情况来看，存在时间大致为夏商与西周时期，以后各代极少出现；关于名称，在以往的报告中存在各种名称，如玉琴拨、玉圭、玉柄形器等等，本文暂借用习惯称法——玉柄形器。

一直以来，大家对这种器物的用途作了各种解释。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认为是装饰品，第二种认为是古人为纪念祖先亡灵所琢制的一种高级祭祀性礼仪玉器（如近代的木制灵牌）^{〔1〕}，第三种是李学勤先生认为柄形饰是《周礼·春官·典瑞》中所记载的“裸圭有瓚”中所说的“裸圭”，第四种是王永波先生认为是以起军旅的牙璋或是平首圭^{〔2〕}。虽然各有不同，但后三种说法，都认为玉柄形器是一种礼仪用玉，只是具体用途有些不同。

另外有的学者其功能除了作为礼仪用玉之外，不排除作为装饰品的可能性。从大的范围讲，都是一种装饰于它物或人的饰品，只是目的不一，有的是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美，而有的是为了增加一种威严、肃穆或是神秘的气氛，所以这种说法过于模糊，不具有论证的意义。

鉴于以上情况，笔者依据近年来在三代墓葬中出土的玉柄形器的数量、造型、纹饰、组合关系等，梳理其发展的大体概况，对其功能作了一

些粗略的分析和推测，提出一点新的看法与认识，就教于方家。

一、玉柄形器出土概况

1、出土时代与范围

从玉柄形器的出土情况来看（详见附表一、二），这种器物开始出现于夏，流行于商与西周时期，尤以西周中期为鼎盛期，基本不见于春秋以后各代。其分布范围以每个朝代的都城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如夏代主要分布在河南偃师附近、商代主要分布在河南安阳附近，而西周时期主要分布在陕西长安、宝鸡、扶风等地与河南洛阳周围，而这几处皆是当时的宗周与成周所在地的周围，且主要分布于大中型墓葬中，墓主人身份皆是王室与贵族。

2、出土位置

从上述对玉器出土位置我们可以知道，一般仪玉类器物大多位于棺顶、墓主身腰部、胸部、身侧、头侧等位置。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玉柄形器大多处于腹部或下肢左侧或是腰部、头侧等；商代玉柄形器的位置大多在腰部、胸部等位置。在西周时期，玉柄器除了在以上各位置之外，与玉戈等一样，大量出现于棺盖上或是在手中，而在大型墓中是与玉戈相叠放的；另外，有装饰的玉柄形器是以玉柄形器为柄，放置时也大多是有装饰束腰的一端与墓主人头向一致，其处应是握

柄处。

二、玉柄形器造型分析

从上面的出土概况对玉柄形器有了大致的了解，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器物的功能用途，有必要对玉柄形器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为了便于理解，我们此处将出土玉柄形器的样式分为两种：没有装饰附件的玉柄形器（本文暂称为单体玉柄形器）与由一件单体玉柄形器与玉片等组合起来的（本文暂称为组合玉柄形器）玉柄形器。我们现对这两种造型进行具体的分析：

1、单体玉柄形器

从出土情况来看，总体形状为扁平形，上有柄首，其下略内凹为颈，整体从上至下略收，下端或平或尖或有棒。长度不一，长者有超过二十厘米者，小者从十几厘米至四、五厘米不等，带有纹饰者偶见于夏商两代，以西周时期为主，精美者皆出于大型墓葬。有的玉柄形器出土时残，是否为人为因素，尚不能定论。

单体玉柄形器存在时期较长，三个时代皆有出土，出土数量较多，范围较广，夏商两个时代主要出于河南偃师、安阳两地，也即是当时的夏与商都城范围之内，西周时期这种玉柄形器出土范围扩大，除了当时的都城附近有分布外，其它的诸侯国如山西、山东地区也有少量出土。

2、组合玉柄形器

出土年代仅限于西周时期，流行的时间是在西周中期，西周晚期已经衰落。夏商未见有出土。出土范围目前考古出土的情况看都是出于墓葬之中，分布范围较小，除早期在河南洛阳地区有出土之外，大多数集中于陕西扶风、张家坡、宝鸡等地。精美者多出大型墓中。

组合玉柄形器的长度大多比单体的长，大都在十几厘米左右，很少有四、五厘米的，这类器物的柄部比单体的造型要多，有的为素面，有的有精美的纹饰。从其造型纹饰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中轴线上按一定距离连成五组玉饰物，排列次序是：带浅槽小玉饰、凹形小玉饰、圆形小玉饰、圆形小石饰、带浅槽小玉饰，带扉棱小玉条左右对称排列在两侧，两侧内空档部分由绿松石片成双层镶满，通长大约在二十厘米左

右，如宝鸡茹家庄墓地墓甲的就有19.3厘米（图一）。从其柄形器来看，有四种形制：素面、简化花瓣、鸟纹带扉棱、素面玉片等，其中鸟纹最为精美，这种形制多见于大型墓中，如宝鸡茹家庄墓地墓甲所出者（图二）。



图一



图二

这种造型大都出于陕西地区：如宝鸡茹家庄墓地出有十九组，这一时期大约是昭穆时期；长安普渡村出有三组；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数量最多，时代主要集中于西周中期，即恭懿孝。除部分保存较好之外，大部分已不能复原，所以从原报告的资料仅能得到十二组，墓地中共出有十三件这种柄形玉器，报告中称大部分是组合式，但只介绍了七组；扶风强家一号墓中出土的组合式玉柄形器，大约有六组，其中一组束有一圈金箔，惜皆无法复原，此墓的年代大约是孝夷时期，即西周中期偏晚。

第二种，出土时四周有木迹和漆片痕迹，或是具有金箔作为装饰。前者主要出于洛阳北窑西周墓地早中两期中，出有9组，以其中一件的镶嵌部分为例说明（图三）：在其刃部下端长9、宽6厘米的范围内，布满了长方形小绿松石片和上下两层略为弯曲的长条形小玉片，下为一长方

梯形蚌托和圆形玉柱。通长 28.5 厘米。在鞘形饰下端，有一件圆形漆器残迹，上部残乱，下座呈喇叭形，内为朱红色，外呈黑褐色，间以绿色纹样。在接近喇叭口处饰四周弦纹，每二周为一组。在两组弦纹附近，镶嵌六片椭圆形绿松石，从其残迹的形状来看，很可能柄形器的特制鞘饰。后者主要出于宝鸡茹家庄墓地 M1 乙室中出土的组合玉柄形器还以金箔作为装饰；另外扶风强家一号墓中出土的玉柄形器，其中一组束有一圈金箔，惜皆无法复原。以上出土墓葬时代大都是在西周中期。

从以上出土情况来看，以上两种类型的流行时间，即西周早中期，无论从造型，还是从数量上看，这一时期是组合玉柄形器的鼎盛时期。

第三种，是指柄部为玉片的一型，作为器柄的玉片有以下几种形式：较为规则的长方形、顶端倾斜（如所谓的“半圭为璋”的璋，有的报告中即称为璋）的长方形、顶部两侧抹角，器身两侧向下微收的长方形、顶部出一扉棱的长方形以及无任何规则形状的玉片，以前两种为主。其下的镶嵌部分一般为无扉棱的小玉片，分三列，每列有三至四片，正反两面相同；极少数也有用蚌片的，虽然简单但是很有规律，可视为此类组合玉柄形器的常规形态（图四）。

目前考古出土的此类器物主要有：张家坡墓地有七组，时间为西周晚期大约是夷王至幽王时；河南洛阳北窑西周晚期墓出有一组、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1 在报告中未有任何叙述，但是从其墓葬平面图上可以看出在内棺盖上应有五组，其组合方式较为简单，这种玉板报告中称为平匕与角匕，墓葬年代为西周晚期宣幽时期；另外在山西天马一曲村 M8 中，从墓葬平面图上看，在墓主身上应有这种组合式玉柄形器，但简报上没有描述，只能从其图上观察大约有四至五组，时代为宣王时期。从这一种类型所出墓葬的年代来看，此型流行时间是西周晚期，从造型与数量上都可以看出组合玉柄形器在西周晚期已衰退。

三、玉柄形器的功能试析

针对以上对玉柄形器考古出土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其功能进行探析：

1、从玉柄形器的出现、存在时间及位置看，

它应与戈、圭、戚等一样，是一种礼仪用玉。而其功能也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略有不同，下面就这一问题进行试析。

单体玉柄形器大多较短，其下有孔或是有榫，有的学者曾经推测过其应是嵌于某种器物上共同来组成一件完整意义上的仪玉，具体使用方法或能拿在手中，如玉钺的使用就是如此，其使用方法已见于良渚文化^[3]，山东前掌大商墓就出有完整的玉钺组合^[4]。

而夏商时期的用玉，从玉器造型上来说，更多的是与战争有关代表王权或是武力的仪仗用玉，例如当时的玉戈、玉刀、玉璋等等，此时玉柄形器异军突起，也应是一种与非实用性生产工具或武器相辅相成的仪玉，所以这一时期的功能与用法大致如上面所说，所以这一时期尤其是夏代的玉柄形器大多出于头部位置；再者，从其出土的精美者来说如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兽面玉柄形器（图五），与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如此相似，我们可以看出玉柄形器应是一种与王权、神权有关的仪仗用玉，这一点也可以从其出土的情况来加以说明：夏商时期出土的此类玉器皆出土与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地带如夏代主要出于河南偃师，而商代主要出于安阳附近，且大而精美者多出大型墓葬中，墓主人身份都是高级贵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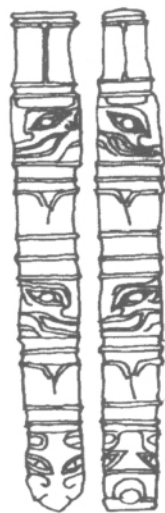
商后期的玉柄形器功能与此相似，只是数量增多，造型更加丰富。商时注重鬼神与祖先崇拜，就需要不断地与上天对话与祭祀，而进行这



图三



图四



图五

一系列的活动就需要“礼器”与“牺牲”，因此玉柄形器、玉璧、动物类玉器等礼器大量增加。

西周时期有所不同，统治阶级注意“明德慎罚”，以控制精神为主，以武力统治为辅，所以流行于商的象征王权与军权的玉兵器进一步减少，而玉柄形器也就承担了更多的含义，其中武力的份量开始减少，而“德”的内容开始增加，更多的玉柄形器开始向佩饰转化，或者说在礼仪用玉的功能上增加了装饰的功能，这一点也可以从上面的出土概况得到论证：此时的大量玉柄形器出现在腰部，即表明这种器物由表示权力、威严等开始向表示某种身份转化，为了使其更能代表佩带者的身份，此时出现了大量装饰精美的组合玉柄形器，且从出土情况看很多在外面还有质地各不相同的囊袋，以便更好地佩带与保存。尤其是西周玉柄形器上凤鸟纹的大量流行，将这种仪玉的功能推向了顶峰。

从以上第一二两部分对于玉柄形器的出土概况与造型种类的分析来看，西周晚期是玉柄形器的衰落期，其具体表现有二：一、玉柄形器在这一时期大多制作比较粗糙，质地大不如从前，例如西周晚期出现的第三种类型的组合玉柄形器，下面的装饰部分开始出现有蚌片装饰的情况；二、由出土位置来看，这一时期玉柄形器的功能开始发生改变，例如山西曲沃村出土的玉柄形器有一部分已经转化为葬玉，在M91中缀玉帛目中的附件鼻就是玉柄形器，而在M102中，玉柄形器转变为墓主人手中的握玉。从此处可以看出，此时的玉柄形器已转化为他物使用，原来象征权力、身份、地位与威严的功能已不复存在，正如玉琮在两汉时期被改做为容器^[5]与生殖器套使用一样^[6]。

另外我们从附表一、二中也可以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最晚的玉柄形器出土于春秋早期，数量非常稀少，也就是说这种出现于夏，流行于商与西周的仪玉从春秋时期开始突然消失，其消失的原因可能有如下两种：一是由玉质转化为其它质地，例如在春秋中期出现过铜质柄形器^[7]，但数量很少。二、春秋时期墓葬中出现的大量的形状各不相同的玉片，在报告中很多称之为圭形玉片，这种玉片与西周晚期出现的一些的玉柄形器的简化形式很是相似，是否可以认为玉柄形器这

种礼玉随着用玉制度的发展，为另外一种礼玉

玉圭所取代，其造型也在慢慢向圭形转化，以上原因只是笔者的推测，正确与否还有赖于以后的考古论证。另外玉柄形器的突然消失是否是当时的政治背景平王东迁有关尚不得而知。

2、从上面得知玉柄形器是一种仪玉，但是其具体功能作用用途只从出土情况很难得出，而这也正是玉柄形器定名的关键所在，而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只能将考古出土的玉柄形器进行历史学观察，即从典籍入手。

在三代的典籍中关于用玉制度多有记载，其中《周礼·考工记·玉人》中有关礼仪用玉制度的记载非常详细，也有学者作了详细的论述，认为用玉制度的大多记载并不可靠^[8]，带有儒生的理想成分，但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笔者对此种说法并无异义。在这里就《考工记》中关于命圭的记载出一点新的看法，从中来考察考古出土的组合玉柄形器的功能。

第一，《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命圭“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瓚，伯用将”^[9]，释^[10]为：“此经因天子以下执玉，遂说尊卑之玉，善恶不同。先郑云‘全，纯色也。龙当为虬，虬谓杂色’，后郑以为全，纯玉也。纯玉即纯色，义无殊。……云‘龙、瓚、将，皆杂名’者，谓玉之杂名。此亦含杂色。……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者，按《礼纬》云：‘天子纯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有些学者认为此处所说玉色问题实为同一玉器的玉质问题，其实不尽然，在当时区别不同质地的玉器，虽然可以通过玉色来辨别，但是应不会准确至用数字来明确划分。现在考古中也没有出土过此类玉色如此分明的玉器。

我们换一角度：释中所说玉色问题实为玉石质地，从“石之美者皆为玉”中可以窥见古人是能分辨出玉与石的质地的。按此看法，《周礼》中所说与考古出土的组合玉柄器就达到了惊人的一致，组合玉柄形器是单体与镶嵌部分组合，其镶嵌部分大多是玉与石或是其它质地的片组成（详见第二部分对玉柄形器造型分析）：第一种形式的玉柄形器的镶嵌部分的五组玉饰：带浅槽小玉饰、凹形小玉饰、圆形小玉饰、圆形小石饰（多为绿松石）、带浅槽小玉饰，恰为四玉一石，

这与“公侯四玉一石”相合。且出土此式的都为大型墓葬，墓主身份多为诸侯国君或其夫人，这也与记载“公侯”相合。

从上面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流行于西周早中期的大量组合玉柄形器即为周制命圭，其使等级的差异在于镶嵌部分中五种形状各异的玉石片，具体使用规则为：天子所用的命圭的五饰皆玉，而公侯一级为四玉一石，而伯子男为三玉二石。

仅凭此处玉质一点对于组合玉柄形器是命圭的说法尚显欠缺，因此下面从命圭长度与装饰两方面与考古出土组合玉柄形器情况作进一步论证。

第二，从其长度来看，“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按当时一周尺相当于23厘米左右来看，尺二寸相当于27.6厘米左右；九寸相当于20.7厘米左右；七寸相当于16.1厘米左右。而现在考古出土中的组合玉柄形器的长度，据笔者统计（此数字来自原报告）：宝鸡茹家庄墓地的玉柄形器在13厘米与22厘米左右，河南洛阳北窑的组合玉柄形器长度较长（原报告中大多是和漆鞘一起计算的），大多是在25厘米与30厘米之间，短者在15厘米左右，其它墓中所出土的尺寸大约与前者相似。从上面的数字来看，典籍中命圭与考古出土的组合玉柄形器的尺寸非常相似。其中虽然有尺寸短者，但也都超过了10厘米，在长度上是相吻合的。

第三，《周礼·考工记》中载“天子圭中必。”在《周礼注疏》^[11]释曰：“上列天子及公侯伯之圭，于此独言‘天子圭中必’者，按《聘礼记》，五等诸侯及聘使所执圭璋，皆有纁藉及纁组，纁组所以约圭中央，恐失坠，即此‘中必’之类。若然，圭之中必，尊卑皆有，此不言诸侯圭，举上以明下可知。”也就是说为了防止这种瑞玉的失坠，要有东西来约束玉圭，而这种约束一般认为是丝麻质地的组索。有的学者认为南越王墓中出土玉璧上的十字形丝织品痕迹的现象，接近于“圭中必”的记载^[12]，笔者认为有待商榷：首先，这种玉璧上的丝织品痕迹是组合玉佩上的“绶”带，而不是为了约束玉璧防止脱

落的“必”；其二，此时仪玉制度只是汉儒的附会，用汉代遗址的资料只能证明汉时的用玉制度，而不能证明周代的礼制，况且玉璧此时主要功能是佩饰品，而非瑞玉。

所以笔者认为从组合玉柄形器出土时的情况：如洛阳北窑西周墓地的组合玉柄形器下部大多都有圆形漆器残迹，原报告中推测可能是组合玉柄形器的特制鞘饰；另外，在这片墓地中，玉柄形器出土时是横放在椁顶或是悬于墓壁上的，四周和端部往往带有玉片饰的鞘形漆痕，所以原报告中推测“我们推测其可能为商周时期奴隶主贵族为了显示其身份的高贵，出外时将玉柄形器佩带于腰部，居家时则悬挂于墙壁之上或陈之于室内。”而这一情况与“天子圭中必”的记载非常吻合，可以用来说明命圭中的“圭中必”的基本形制，无疑为玉柄形器是命圭提供了另一证据。

从出土情况来看，不是所有的玉柄形器都有漆质鞘形饰，这也从另一方面论证了组合玉柄形器是一种“命圭”：既然命圭的质地与装饰随着等级的不同而不同，其“必”的质地与样式也理所当然随着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宝鸡茹家庄墓地M1乙室中的一件玉柄形器就是用金箔束了一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玉柄形器是夏商时的仪仗用玉，当时的名称很难断定；在周代应是如上所说的瑞圭，组合玉柄形器应是命圭。另外，笔者也认同一个时代的瑞玉并不只有一种的说法，因为制度是由一系列规章制度组成，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系列的程序是要用各种不同的器物来代表的，所以，周代所谓的瑞圭应不只组合玉柄形器一种形制，或许应称为圭类瑞玉。余论

关于这种玉器的来源，有的学者认为是史前流行于良渚与龙山的锥形玉器转变而来，现还缺乏一定的根据。笔者认为玉柄形器最早出现在二里头遗址中，从表面上看很突然，然而仔细想来，许多玉器都是在某一时间突然出现或消失都不是偶然的，如流行于夏商时期的玉戈，就是由史前实用的生产工具转化而来，所以玉柄形器也可能是由某种器物转变而来，不一定是玉质，也可能是其它质地，如木质，很难保存下来。这主要是因为两汉以前，玉器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领域内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所承载的政治、经济、艺术、道德等等的内容随着每个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它的外在表现即其玉器形制就有所不同,所以玉器的主流器型会随着时代不同而消失或产生,而这一论点也可以来解释玉柄形器在春秋早期的突然消失。

注释:

[1] 尤仁德:《古代玉器通论》97页,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2] 王永波:《牙璋新解》,《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36~46页;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分类与分期》,《考古学报》,1996年第1期1~61页。

[3] 张明华:《良渚玉器研究》,《考古》1989年第7期624~635页。

[4] 张明华:《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5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5] 南京博物院:《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考古》1973年第2期80~81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133~143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4年山西省曲沃县曲村两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5期25~33页。

[8] 孙庆伟:《〈考工记·玉人〉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研究》(四)115~139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9] 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文中所引无特殊说明均出自《周礼注疏》。

[10] 李学勤主编、[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下),卷第四十一11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1] 李学勤主编、[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下),卷第四十一11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 孙庆伟:《〈考工记·玉人〉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研究》(四)121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13] 偃师县文化馆:《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第4期270页。

[1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259~263页。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37~40页。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2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1092~1093页。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302~309页。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318~323页。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294~303页。

[2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北二路新发现三座商墓》,《文物》1983年第3期60~77页。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三家庄东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2期126~132页。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491~512页。

[2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6月89~157页。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考古》1989年第7期591~597页。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0年第1期7~19页。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27~118页。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114~195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9~12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2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74~75页。

[30]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325~348页。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高楼庄南发现一座殷墓》,《考古》1994年第5期392~396页。

[32] 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31~78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

[3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等:《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20~32页。

[34]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殷代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5年第1期2~11页。

[3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武安赵家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351~362页。

[36]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17~30页。

[37]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141~159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38] 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新发现一批纪国铜器》,《文物》1985年第3期1~11页。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周墓地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7期13~28页。

[40] 德州行署文化局文物组、济阳县图书馆:《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早期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18~24页。

[4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六号墓清理报告》,《文物》1996年第12期6~24页。

[42] 德州行署文化局文物组、济阳县图书馆:《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85年第12期15~20页。

[43]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济宁地区文物组、曲阜县文管会:《曲阜鲁国故城》89~188页,齐鲁书社1982年。

[4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

宫长子口墓》150~181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4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149~156页，242~246页，294~297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4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顶山市北滢村两周墓地一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31~43页。

[4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地》394~39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4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虢国女贵族墓出土玉器精粹》102~145页，众志美术出版社，台北，2002年。

[4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130~203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5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地》353~366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5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267~294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5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地》408~456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5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52~253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

[5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31~127页，三秦出版社1994年。

[55] 卢连成、胡智成：《宝鸡强国墓地》17~456年，文物出版社1998年。

[56] 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罗西章：《北吕周人墓地》28~129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

[57] 罗红侠：《扶风黄堆老堡西周残墓清理简报》，《文博》1994年第6期80~86页。

[58] 罗红侠：《扶风黄堆老堡三座西周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18~27页。

[59]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77~85页。

[6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18~78页，236~30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6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4~12页。

[62]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4~28页。

[63]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天马—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第3期11~30页。

[64]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4~38页。

附表一：夏商玉柄形器出土情况

出土地点		年代	墓主人	出土位置与数量	出处
河南偃师四角楼				1	[13]
河南偃师二里头	K3	三期		玉柄形器1 在正中	[14]
	K4			1	
河南偃师圪垱头村		二期偏晚		柄形饰 1 头右	[15]
河南偃师二里头 M8		二、三期		1	[16]
河南偃师翟镇公社圪垱头探方		三期		3 裹在朱砂里	[17]
河南偃师二里头村	M6	四期		柄形饰 1 位于中右侧	[18]
	M9			柄形饰 1 位于中右侧	
	M11			柄形饰 3，头顶一、头右一、墓中部右侧一	
河南偃师二里头		夏四期		2 柄形饰在中右侧	[19]
河南郑州北二七路	M1	商中期	奴隶主	柄形器 3 于腹部或下肢左侧	[20]
	M2		奴隶主	玉柄形器 2 出于胸部和腰部	
安阳殷墟三家庄 M1		大司空村一期		柄形器 1 在颈	[21]
河南安阳小屯村 18 号墓		殷墟二期	殷王室成员	柄形饰 1 在腰右侧，	[22]
河北藁城台西遗址		二里岗上层至殷墟文化早期		1	[23]
M101		殷墟文化一二期		1	
河南安阳市北郊大司空村 M25		二期中段	地位较高	玉柄形器 1 靠颈部，1 在胸腰处	[24]
河南安阳花园庄 54 号墓		殷墟二期偏晚	兵权在握的显赫贵族	1 在棺内	[25]
河南安阳殷墟西区 939 座		殷越墟一至四期	平民、贵族	16	[26]
河南安阳殷墟 5 号墓		商中期武丁时期	商王武丁妻	约 33	[27]
河南安阳殷墟郭家庄	M53、M135	殷墟二至四期		3	[28]
	M160	殷墟三期偏晚	址族首领或上层	玉柄形饰置于墓主腰部	
河南安阳殷墟				1	[29]
河南安阳小屯村 M269		殷墟三期偏早	中型贵族	1 在右腰	[30]
河南安阳高楼庄		四期晚约帝乙时期		1 在腰坑	[31]
河南安阳大司空村		殷晚期	王室的亲从或是家臣	4 在腰	[32]
河南安阳武官村坑 6					[33]
河南安阳 M14		商			[34]
河北武安赵窑 M10、M17		商代晚期		玉柄形器 2 在口中或腰部	[35]
山东益都苏埠屯		商	方国		[36]
江西新干大洋洲		殷墟中期	扬越族国家统治者或家属	3 在脚部左右	[37]
山东寿光城北		商末	陪葬坑	柄形器 3 在玉戈南，东西排列	[38]

附表二、西周时期玉柄形器出土情况

出土地点		年代	墓主人	出土位置与数量	出处
山东滕州前掌大村 M119		西周早期	东方方国贵族	柄形饰 2 在头左上	[39]
山东济阳姜集公社刘台子	M2	早期		柄形器 1 出于玉匕右手前方；	[40]
	M6	早期偏晚(昭王)	逢国某国君夫人	头右上侧有柄形饰 2 ,一左侧	[41]
	M3	早期偏晚(穆王)		1 下颌骨上部	[42]
山东曲阜鲁城西“望父台”墓地 M48				剑鞘形玉饰 2(柄形饰 其一有重环纹)在左胸和左手	[43]
河南鹿邑太清宫		初期	长国诸侯,长子口臣服于周,按商俗葬	柄形器 29 在棺内各部位,个别出于椁室	[44]
河南洛阳北窑上窑村西周贵族墓地	早期偏晚			玉柄形饰 20 主要出在大墓中,中型墓仅 M440、M211、M155 出土。(带鞘形饰的复合柄形饰 8,在中型墓中仅 M155 出土一件,余均在大墓中。)	[45]
	中期			玉柄形饰 3 在腰部	
	晚期			柄形饰(M95)	
河南平顶山市北滢北村		宣王之际	应国下大夫级	玉柄形器	[46]
河南三门峡上村岭	M2016	晚期	士级贵族	柄形器、凤鸟纹佩、玉匕在棺盖板上	[47]
	M2006(第八组虢仲组)	晚期	贵族夫人孟姑	柄形器腰部偏右,戈在椁室西北,条形玉饰在棺盖上	[48]
	M2001	西周晚期宣幽时期	虢国国君虢季	柄形器 2 长条形玉残片 3、匕 3、璋、窄援戈、圆形玉片、石戈 3 枚壁出于左肩下	[49]
	M2011		虢太子	柄形器在盆骨中	[50]
	M2012	晚期晚段,宣幽时期,早于虢季	虢季夫人梁姬	柄形器 8,内棺盖上、椁室北角、在腰部,1 件折为三段在脑后和腰下,1 件折为三段在颈间偏右、颈间,1 件折为三段(2 段在腰下右侧,1 段在右手处)	[51]
	M2017	晚期	士级贵族	柄形器 2 玉管、玉匕在棺盖板上	
	M2119	晚期	大夫	柄形器在胸正中	
北京琉璃河	M53	早期		1 在胸部	[53]
	M51	中期		1	
陕西泾阳兴隆乡高家堡村	M1	先周文王时期	戈国国君𤞵	在墓主胸腹部	[54]
	M4	早期	戈国国君弓或弓	柄形饰出于椁室北端	
陕西宝鸡竹园沟墓地	M13	康王前期	一代彊伯	柄形器在头左棺旁	[55]
	M5	穆王至恭王		柄形饰在右小腿外侧	
陕西宝鸡茹家庄墓地	M1 甲室	昭王末年至穆王晚年	彊伯妾	柄形饰 7(下有镶嵌部分)4 集中在头部、面部	
	M1 乙室		彊伯	柄形饰 14(部分有镶嵌部分,中部用金箔作饰,在竹园沟、茹家庄仅此一例)柄形饰 9 在胸、腹部,柄形饰(镶嵌部分)在腹部,柄形饰 5、在椁盖或棺盖上	
	M2		彊伯妻井姬	柄形饰 6(一件镶嵌绿松石)在胸部和腹部正中腰部左侧有玉柄形饰(带镶嵌)	
陕西宝鸡荒塬坡	M25	西周		玉柄形器	[56]
陕西扶风黄堆老堡	M34			玉片(嵌在柄形器上)	[57]
	M39			玉片(嵌在柄形器上)	
陕西扶风强家一号墓		中期孝夷之世		乙组:柄形器丙组:玉圭,下为小玉片和绿松石片拼合而成的长方形饰物;丁组:戈组:玉圭 3,下有拼合饰物甲组在墓主头顶,乙组在头上近棺处,丙组在头骨两侧,丁组在颈部,戊组(组合玉柄形饰)在手中	[58]
陕西长安普渡村		中期		柄形饰 1 在腰坑右下角	[59]

续附表二：

出土地点		年代	墓主人	出土位置与数量	出处
陕西长安马王镇张家坡	M157	恭、懿、孝之际	某代 井叔	柄形饰(缀以几行带齿的小玉条和绿松石组成)	[60]
	M170			玉柄形器(多作长条形,少数为方柱形。一端装饰有若干小长条玉片与绿松石片)	
	M152		井叔	玉柄形器	
	M168		井叔	玉柄形器	
	M121			玉柄形器 6 其中一件刻龙纹和鸟纹的柄形器出于外棺中部,相当于腰部。	
	M163			柄形器 3 柄形器分别在腰部、棺内西南角和西壁北部	
	M196			玉柄形饰	
	M216	夷厉共和时期		柄形饰在胸部	
	M253			玉柄形饰在腰部	
	M320	宣幽		玉柄形饰 3	
	M141	昭穆时期		玉柄形饰 2 ,石柄形饰在胸前	
	M183		孟员	玉戈和柄形饰 2 在胸部(一反一正放)	
	M285	武成康时		玉柄形器在胸部	
山西曲沃县曲村镇北赵村	M113	早中期	晋侯燹	玉柄形器压在墓主胸前	[61]
	M13	穆王时期	晋侯夫人	腹部及足部有柄形器	[62]
	M8	宣王 16 年至 43 年间(B.C812~785)	晋献侯(籍苏)	柄形器若干,胸腹部正中放带玉缀的柄形器,上为玉组佩,左右两侧压有玉板及带缀柄形器,大腿及小腿各有柄形器	
	M62	西周末年	晋侯邦父夫人	玉覆面上下各有一组串饰,覆面上压有一组柄形饰及 2 件玉块	[63]
	M91	厉王前后	晋靖侯	玉覆面(玉柄形饰为鼻)、	[64]
	M92	厉王前后	晋靖侯夫人	腹部以下有柄形器	
	M93	春秋初年	晋文侯	右膝右侧有柄形饰	
	M102		晋文侯夫人	玉柄形饰在双手	

(上接第 8 页)

(附表)

昭通市水富县张滩土坑墓

墓号	墓向	葬具	葬式	墓主年龄	随葬品				墓葬尺寸	备 注
					陶器	铜器	铁器	料饰		
M1	320°	无	不明	不明	3 件	2 件			墓长 2.5m, 宽 2m, 深 0.3m	C 型陶罐 2 件, A 型铜剑 1 件, 铜矛 1 件。
M2	320°	无	不明	不明	5 件	2 件	2 件	1 颗	墓边尺寸不清	B 型陶罐 1 件, B 型铜剑 2 件, 无法修复陶器 4 件, 料饰 1 颗, 铁器 2 件。
M3	320°	无	不明	不明	2 件	2 件印章 1 枚半两钱 3 串	2 件		墓边不清, 深 0.8m。	B 型陶罐 1 件, 无法修复 1 件。铜釜 1 件, 铜锯 1 件, 印章 1 枚, 铁剑 1 柄, 铁斧 1 件。
M4	320°	无	不明	不明	10 件	9 件	1 件		长 3.22 m, 宽 1.42 m, 深 0.25 m	A 型罐 2 件, C 型罐 1 件, D 型 1 件, 陶豆 1 件, 陶器盖 2 件, 其他陶器不可取。铜剑 A 型 1 件, 铜矛 2 件, 釜 1 件, 环首铜刀 1 件, 铜钺 2 件。
M5	320°	无	不明	不明	8 件	印章 2 枚			墓边不清	B 型陶罐 3 件, 陶器疏碎不可取。
M6	320°	无	不明	不明	10 件	2 件			长 3.0m 宽 1.12m, 深 0.30 m	陶豆 1 件。C 型陶罐 3 件, D 型 2 件, 铜器疏碎。